

看·世界遗产



京杭大运河江苏省宿迁市宿豫段，装载农资、建材等货物的船舶有序航行。
陈红摄（人民视觉）

第78届联合国大会6月7日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全会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决议邀请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等庆祝该国际日。中方鼓励各方根据联大决议规定，举行丰富多彩的国际日庆祝活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傅聪在联大通过决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习近平主席去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呼应。国际社会一致支持联大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充分表明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时代需求，充分表明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据新华社联合国电）

链接

大运河边不缺繁华，但2024年尤为特殊，叠加并孕育着继往开来的隆重与兴奋。

时光一晃过去十年。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纵观刚刚过去的6月，大运河沿线以多种多样的活动，致敬无数人的奉献，分享亲历与成果。

在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应该将目光眺望得更远一些，在更为广阔的大运河生态空间中看待这一世界遗产的孕育、成长、传承过程和持续惠泽未来的意义。

我们用3个“20”年，来描述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和当今时刻。

从第一个“20”年到第二个“20”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国至今为世界呈现的57项世界遗产，我们对世界遗产中国特色的思考、实践和对文明交融的时代责任感，皆始于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中国乃至全球世界遗产事业，其实有两个重要节点，其功能、意义，值得反复再观和体会：这份手写的“第663号”提案正式提交时间，是1985年4月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决定》时间，是1985年11月22日。

这一组时刻，为何重要？在社会发展时空中，我们只寻迹世界遗产长长的“群星矩阵”中的一小段，看看大运河是怎样成为世界遗产的，辨析其发展轨迹与前后逻辑，就能理解为何不应将目光局限于“申遗成功10周年”：2005年，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运河三老”写信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步伐——我们将这封信的发布，称之为大运河申遗“按下加速键的时刻”。而这封信的推出时间，信中推出的主角“大运河”（当时文本中还只是表述为“京杭大运河”），都刻意挑选了“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走过20年的纪念时刻。”

我从小生长在运河边，20年前开始加入保护、传播大运河历史

大运河的三个“20年”

齐欣

文化遗产的行列。作为呼吁信的起草者，我亲身经历了落笔前那漫长的思考、多方交流还有反复切磋的过程。可以说，这份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文本，蕴含着再出发的动能；其中每个字，都高度凝练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认知与责任感，至今读起来未显丝毫过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即将进入第三个“20年”

大运河申遗，为何在2005年进入快车道？因为那时，世界遗产事业已深度融入到飞速发展的社会建设与生活中；中国也由一个学习者逐步完备了奉献、创新的能力。进入到第二个“20年”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实是隐藏在各个申遗项目背后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的保护目标，由重点提举闻名于世的“点”，进入到跨领域、跨地域的“线”和“面”，进入到需要识别、传播那些还不广为人知的遗产

价值。也就是说，大运河申遗，“等到了”一个新背景，“踏进了”一个全社会共同激励、推动和实践的新阶段——在2024年回望，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历，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的重要标识和第二个“20年”的成果旗帜。而大运河又给当今世界新生着巨大的推力，激励了一代一代的奉献者，积淀丰富的新认知和新智慧。

将这些有逻辑联系的事件串联至今，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动态发展过程，历经了40年的发展，即将进入第三个“20年”。如果说第一个“20年”的特点是“专业性成长”，第二个“20年”的特点是“社会共同参与”，那现在第3个“20年”，我们面临着什么？又应该如何融入、创造？

进入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

2025年的6月10日很快就会到来。在下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我们以大运河能讲述怎样的故事？

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又在怎样影响着人们，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生活在河边的人们也在努力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每一年的答案都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总在不断加深。以前去看大运河时，我还在找寻那些“老”的痕迹，但现在则更多观察“河”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大运河对社会生活、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会发展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哪些，贡献了什么？大运河以其宏大规模和持久的发展历程，真实、鲜明地展现了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特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各地共同思考世界遗产“下一个50年”目标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更加明确地探索这一跨越9个纬度的人工工程活跃至今的源

泉与动力，也就是大运河不仅仅属于中国人，而且属于全人类、属于未来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每天上班时，还要往返穿越大运河的最北端通惠河。有时伴随着朝阳，有时是夕阳西下或见到万家灯火，每每站在河边，引发我这样遐想：“总有一天，人类将离开地球，奔向浩瀚的宇宙，在洪荒中开始全新的一切。那时，还会再造一条又一条的‘大运河’吗？能吗？”

历经在河边反复行走和感受，我现在有把握去说遇到的每一个人：大运河绝对能带给我们这种信

心和勇气，绝对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那种面向未知时的坚韧、团结和彼此信任的本领。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近40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遗产的认知，描述近20年来全社会对大运河认知的改变，那就是：原来我们以为，大运河时代已经消逝；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地认为这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当下的选择关乎人类的未来。而这个充满朝气，繁荣进步的大运河，值得呈现给世界，值得人类的未来从中受益。



今年6月，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游览。
苑立伟摄（人民视觉）



游客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观。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关于大运河申遗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申遗用了多少天？申遗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等话题引发关注。

时间回到2014年，北京时间6月22日，从卡塔尔多哈传来好消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今，大运河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运输方式。

大运河河道距离长、流域范围广、遗产类型丰富、利用功能多样、保存现状复杂，如今保存下来的与大运河相关遗存总数已超过1200处。从地理分布看，大运河世界遗产分布在8个省（直辖市）27个城市，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这些遗产展示了历史的发展、河道航行景观、水管理技术设施以及运河相关的城市景观、历史遗迹和文化传统。

大运河的申遗之路历经数年。2006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三位年长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工艺美术工作者，怀着急切的心情，联手致信给您，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

大运河申遗上热搜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程……”这是2005年12月，时年61岁的朱炳仁，与90岁的郑孝燮、82岁的罗哲文联名写给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市长的信。这封信推动了大运河申遗步伐，写信的三人也因此被尊称为“运河三老”。

关于这封信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背后的故事，曾记录在本报2014年6月27日所刊登的《大运河申遗的3111天》一文中。

如今80高龄的朱炳仁回忆起当时写信的初衷说：“我就住在运河边上，每天都接触运河。大运河哺育着整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跟运河息息相关。年轻时，我曾目睹运河旁边一些文物被破坏，有些水被污染，老百姓感到生活不便。于是当时就跟两位古建筑专家、文物保护泰斗，联手进行保护工作。再加上我在杭州，他们在北京，一南一北，有其代表性理念，于是一起提出京杭大运河申遗。”

朱炳仁认为，在这封信受到关注之前，大运河申遗的序幕已经拉开。“这封信起到了推动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运河沿线各个城市已经对联合申遗有了强烈的愿望。”

二

从申遗成功至今，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不断翻开新的一页：2017年，首次提出大运河文化带；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发布实施；2020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发布；2021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四梁八柱”规划体系正式形成——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文物局、水利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分别编制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4个专项规划，指导沿线省（市）编制了8个地方实施规划。

从申遗成功至今，大运河沿线的多座城市经过连续多年的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水美业兴的运河生态重现。2022年4月，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

这些年来，大运河考古成果丰硕，相继发掘出一批闸、坝、桥、纤道、码头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为研究运河的管理、变迁与工程技术成就提供新材料、新视角。

据不完全统计，大运河沿线8省（市）共开展超过200项运河考古工作，其中60余项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隋回洛仓铭砖、唐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等文物见证着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唐三彩马俑、宋青白釉“国清”款刻花碗等文物则记录着运河沟通世界的对外交流……今年5月，在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展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上，亮相的文物展示了大运河促进了南粮北运、商业贸易、人员往来的故事，也展示了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新变化和成就。

正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倪玉平所说，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它不只在文字和史料记载中，还是鲜活的、流动的。

阿根廷向中国返还14件文物艺术品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晓霞）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日前，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接收阿根廷向中国返还的14件文物艺术品。

此次返还的14件文物艺术品为我国非法出境文物，其中7件青铜甬钟的时代应为春秋晚期，其余陶俑3件、俑头2件、铜蛙1件、铜盃1件，时代在汉代至南北朝之间。2018年，上述文物由阿根廷联邦警察文化遗产保护分部在开展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文物非法贩运国际联合行动“雅典娜行动”中，依据国际博物馆协会与我国联合发布的“中国濒危文物红色目录”查获。2019年，国家文物局获悉消息后，协调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持续开展工作。2023年12月12日，阿根廷法院作出将14件文物艺术品归还中国使馆的最终判决。

据悉，中阿两国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2018年，两国签署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政府间协议。本次返还是中阿签署协议以来成功开展的首次合作，对双方深化文物返还等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阿根廷向中国返还的青铜甬钟。
马丁·萨巴拉摄（新华社发）